

一五一十
周刊
NO. 110
2013年6月14日
政治的婚姻
与
婚姻的政治

编者的话

自 3 月 22 日彭丽媛随其丈夫——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起，中国“第一夫人”的几乎每一次露面，都会引发公众的持续关注和讨论。主席夫人的身份让本已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彭丽媛受到更多的关注，人们从她的言谈、着装、仪态、举止中解读出丰富的政治意义。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从解读当下的“第一夫人热”开始，辅以现代中国多位“第一夫人”的婚姻和政治轨迹，以及特殊政治环境中平凡人的婚姻，来探讨婚姻与政治的关系。

周刊的第一部分汇集了从第一夫人的新形象中读出的政治启示。彭晓芸指出，彭丽媛鲜明的形象是“个性化外交”的尝试，对此的议论承载了希望赢得国际尊重的民意，体现了民间的政治热诚。连清川则认为，彭丽媛在外访中展现的正面形象应该延续下去，应该对国内被不光彩事件牵连的夫人们有所启发。他还指出，尽管“第一夫人”至 20 世纪末才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出现，文革前后的中国也曾有过不同寻常的“夫人政治”。刘洋硕回顾了宋美龄、王光美、王冶平、刘永清四位为现代中国的“第一夫人”在不同政治背景下各不相同的外交经历，与今天的讨论比照来看，体现了高层政治中婚姻与政治互相不灭的影响力。

周刊第二部分呈现历史上中国“第一夫人”的真实生活，在史料中体会婚姻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宋美龄、江青、王光美的婚姻和事业都很与她们各自身处时代的政治息息相关。

除了宋美龄两次以第一夫人身份赴美求援外，杨雨青指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一开始就被评论为“军阀和财产的结合”。之后，各利益方用“婚外情”传言等战术离间二人关系，还常在两人的感情波折中找“政治叛国”的蛛丝马迹，以至蒋介石在 1944 年召集各方代表开茶话会，澄清与宋美龄关系如常。

于之远笔下的江青在 1937 年结束上海滩电影生涯后转往延安，同年与毛泽东结婚，四年内“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待到“文革”时，通过这桩婚姻积累和发展出的权势已是不可阻挡。

王光美的命运与江青因婚姻得势截然相反。文革时，王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鹏口述了在文革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当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成为斗争对象后，他和同学如何骗斗王光美，向周恩来提供整刘少奇、王光美的证据。婚姻在不利的政治形势下给王光美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政治与婚姻这两股共生的力量，深深地影响了这几位第一夫人的人生。

其实，不光是第一夫人，政治对普通人的婚姻也有影响。周刊第三部分选取了几个普通人的例子。周俊生记述了邢燕子和李力群接受组织的婚配，分别嫁给了世代贫农王学芝和革命家高岗，党领导饭桌上临时起意定下当日即结婚。王丽英记录了 1980 年《离婚法》颁布后遇罗锦轰动一时的几次离婚，遇罗锦不断在过去的婚配和追求个人幸福间挣扎。这些故事也是婚姻与政治复杂关系的真实体现。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将本刊分享至：



【启】

8-1 彭晓芸：夫人外交背后：民间在渴望什么？


彭晓芸：时政评论员，现供职凤凰网

> “而对媒体和公众舆论来说，或许也深知这种空前高涨的热忱并不意味着扬此抑彼，而是中国社会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与契机：多种新元素汇聚产生了如此别致的舆论场，民间对“夫人外交”表现的强烈饥渴也源自时代发展需求的催生。”

对中国公众来说，彭丽媛早已家喻户晓。在过去，公众甚至没有怎么议论“歌唱家彭丽媛”的服饰妆扮，关注焦点更多的是她的歌唱功力，也就是说，彭丽媛从来不是一位偶像派明星，而是实力派艺术家。而今天，彭丽媛的衣着打扮、举手投足被前所未有地热议着。这一切，与她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相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也就是国际社会通称的“第一夫人”。

彭丽媛在多年前的一次访谈中非常坦诚地面对过自己的“明星身份”。在她看来，歌唱家这个行业，当然就是以出名为职业成功标志之一。在她看来，歌唱家艺术家与其他行业的人都是普通人，只是职业特质赋予了这一行业知名度，因此，她坦然受之，不卑不亢。当已经是“名人”的彭丽媛以国家元首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种身份的交叠的确产生了特别的舆论效应，吸引了媒体的高度聚焦。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传播学现象。彭丽媛大概还是会像过去的她那样，了解及理解这种不一样的“待遇”来自不一样的职业特质，而不会成为包袱或压力。

而对媒体和公众舆论来说，或许也深知这种空前高涨的热忱并不意味着扬此抑彼，而是中国社会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与契机：多种新元素汇聚产生了如此别致的舆论场，民间对“夫人外交”表现的强烈饥渴也源自时代发展需求的催生。虽然是历史的偶然——这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夫人是一位艺术家，但世界希望看见中国作为“super star”（超级明



星）出现在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社会期待中国形象走出去，与世界潮流融合——这一切，则是历史的必然。即便彭丽媛不是已经成名的“super star”，当她走到这一历史的节点，也极有可能需要深度开拓“夫人外交”舞台。假如她是学者、教师、工程师，也可能以各种方式适应时代的这一吁求，展示第一夫人在外交活动当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和能量。当然，应当承认，彭丽媛知名艺术家身份为充当这一角色提供了更为优厚的条件，值得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

自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国政府并不排斥全球化的政策导向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国际舆论既有对中国崛起可能威胁他国的忧虑，也有对中国更为积极开放地拥抱世界核心价值的迫切期待。数十年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能力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经济全球化方面更是大步前进，但不能不承认，在价值认同和人文融合方面，中国显得谨小慎微，个性化外交更是有待宽松的舆论环境和制度环境提供支持。

有别于外交官作为“组织代言人”、“工作伙伴”的身份，彭丽媛以第一夫人、国家元首“生活伴侣”的形象出现，恰恰呈现了鲜明的个人特质，因应了时代进步的这一崭新要求，因此，舆论热切期盼她在外交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民间政治热忱使然。

有人抱怨媒体过于关注“夫人外交”中的表面元素——如对衣着等时尚话题着墨过多，对彭丽媛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展示得太吝啬，有人则抱怨知识分子赞美彭丽媛是失去了知识人的独立精神，这些都是当前及未来中国社会将要长期面对的舆论生态，背后都有共同的原因，即迎接这样一个“个性化”社会、“人性化”外交的时代，民间的舆论准备可能稍嫌不足。在纷繁的政治新闻中，路径依赖导致的偏狭难以避免，除了批判和建议，舆论可能需要慢慢学会如何在政治生活中表达赞赏和释放善意，当公众表达民意的方式能够像彭丽媛在舞台上那样挥洒自如，张弛有度时，可以说，我们的政治生活会比今天更加健康和有序。

不过，当下中国社会对“夫人外交”这种稍嫌拘谨的热忱不应当被过分苛求，因为那背后承载的，是中国社会渴望融入世界核心价值，赢得国际尊重的强烈民意。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之间，中国应当还有第三个选项，那便是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制度基石，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皈依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家国情怀。健康的民族主义及其背后的民意诉求，不应当被嘲讽，它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良序转型的思想资源和重要精神力量。

对“夫人外交”的热忱正是这一精神力量的一次抒发，一个维度，一个起点。对于渴望融入世界的中国来说，展示中国软实力，仍然需要靠千千万万中国人合力塑造；而对于世界来说，看见彭丽媛的优雅，才仅仅是个开端——国际社会也需要慢慢改变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学会了解日益多元、丰富的中国，乐见中国更加全方位地推进外交事务，实现中国内部良序转型和外部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双赢。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2 连清川：第一夫人的政治学


连清川：IBTimes 中文网总编辑

“

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夫人的政治学涵义，并不完全在国际场合，恐怕也在国内场合。此次的第一夫人旋风给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而如何长期地持续，并且将这股旋风扩大到国内来，恐怕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彭丽媛的个人魅力了。

”

2012 年，一部宫斗戏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话题长盛不衰，那就是《甄嬛传》。在多数中国的想象中，传统中国的后宫政治似乎就应该是如此：残酷、无情、厮杀。当然，后宫戏，包括后宫文学，早就已经在中国存在，甄嬛既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以后宫来开始谈论第一夫人这个话题，似乎显得有些不合适。中国的现代政治最起码早就已经摆脱了后宫这样一种非人道的、有悖于现代性别伦理的制度。不过，我想要说的是，中国人对于第一夫人，或者对于领袖夫人政治这样的现象，仍然停留在后宫戏相似的想象之中。

1949 年以来，夫人政治就几乎是中国政治的几大禁忌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代的夫人，在中国的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的确令人无法摆脱后宫政治的自然想象。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林彪的夫人叶群以及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均在中国政治的运行乃至命运中留下过浓重的笔墨。

这在整个世界的现代政治史上都算是一种稀罕的经历。且不说西方国家的夫人们与政治之间早就以制度的形式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之中，也未曾有夫人们在政治决策和运行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记录，包括越南的胡志明、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日成等。

在建国之后至文革之前，政治领袖的夫人们还普遍地处于一种正常的范围之内，虽然也多数在党和国家的机构中担任职务，但是对于政治的走向尚无重大的影响。而文革开始



之后这些夫人们普遍在政治作用中突显出来，多少关涉着整体制度的崩溃，而政治决策又回归到家庭或家族这样一个原始的状态之中相关。

至于第一夫人，迟至 20 世纪末，在中国尚未一个不存在的事物。1963 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他的夫人王光美穿旗袍、带珍珠项链，曾经一时引发了热潮。但是当时在中国主政的，仍然是毛泽东，也谈不上什么第一夫人这样的概念。

真正能够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视野中的，是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其后，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也曾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然而，他们留在国人心中的印象，是在国事访问时偶尔显露的身影：默默地陪伴在丈夫身边，面带微笑，挥手致意，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话，更不知个性如何。真正赢得了第一夫人名号和风光的，正是此次随同习近平出访的彭丽媛。也就是彭丽媛，使第一夫人真正进入了中国现代化政治的视野。

就现代社会的政治学常识而言，第一夫人既是元首家庭和谐幸福、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象征，她们又能够参与包括慈善、教育和女性平等等方面的工作。如果第一夫人是一个职业女性，那么更能够为元首加分。近些年来，美国几任第一夫人，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布什的夫人劳拉和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都为他们的当选立下奇功。而在外交场合中，第一夫人随访，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既能够表明元首家庭和谐，又能够呈现出元首夫人关心慈善、教育等世界性话题，传递国家的正能量和价值观，可为国家和元首大大加分。

因此，第一夫人在现代社会与外交关系之中，乃是一个正式的建制，而非随意与临时的安排。并非说单身国家元首不存在，而只是指，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一夫人的存在与表现，是一国政治正常、开明乃至优异的一种呈现。

彭丽媛作为一个军旅歌手，长期以来为中国人所熟悉与喜爱，甚至多数时间里其名气大大高于她的丈夫习近平。此次随访俄罗斯，彭丽媛的着装、表现与风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和中国普通民众的大量关注，的确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夫人政治大放异彩的一次表演，也乃是中国政治正面形象的一次展示。

然而，像彭丽媛这样的第一夫人毕竟少见，而其在外交和国际场合之中出现，也自然未必那么频繁。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夫人的政治学涵义，并不完全在国际场合，恐怕也在国内场合。

中国的夫人政治长期徘徊在宫斗戏的阴影之中，而夫人在许多贪渎案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重要作用，这都是中国夫人政治的常态。要摆脱人们于此的固化想象，使夫人政治合于现代社会的框架之中，恐怕最重要的，还是将制度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将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制度化的调整。那么无论夫人仅仅作为一个象征的存在，还是个体的政治发展，都属于正常的范围，从而摒弃想象和推理的存在。



此次的第一夫人旋风给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而如何长期地持续，并且将这股旋风扩大到国内来，恐怕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彭丽媛的个人魅力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3 刘洋硕：第一夫人的外交之旅



刘洋硕：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

后来，《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劝蒋介石让宋美龄去美国演说，“你让她去一次，比 30 个师都有用。”

”

从民国到共和国，从“文革”到改革，中国一共有 6 位“第一夫人”出访他国——她们的故事，也同样讲述着她们所在的那个时代。



1943 年，宋美龄（右）以中国第一夫人身份访美时，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在白宫前合影





1963 年 4 月，刘少奇主席携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与苏加诺总统（左三）一同观看文艺演出时，一起演奏印尼传统乐器“昂格隆”



1997 年 10 月 29 日，江泽民主席携夫人王冶坪访问华盛顿，和克林顿夫妇在白宫合影





2001 年 10 月 29 日，胡锦涛携夫人刘永清访问伦敦

时隔 71 年，当彭丽媛走下莫斯科机场的舷梯，人们仍在谈论 1942 年宋美龄的那次访美。那一次，中国国家元首的夫人首次登上国际外交舞台。

这仿佛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在那之前，王朝的皇后们深藏在宫殿里，远离时事；如今，“第一夫人”出访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外交的重要环节。

从民国到共和国，从“文革”到改革，中国共有 6 位“第一夫人”出访他国。无论如何，她们都已成为中国现代外交的一部分——当然，她们的故事，也同样讲述着她们所在的那个时代。

“她比 30 个师都有用”

2012 年 9 月 9 日，南京长江路 292 号，一件深紫色旗袍回到了“总统府”（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浅黄的桑蚕丝，深紫色半透明的纱，胸前 3 粒翡翠绿纽扣——庄重、华贵。

旗袍的主人是宋美龄。在她离开南京总统府 63 年后，这件华服回到南京。

宋美龄对于旗袍有一种特别的喜爱。1942 年，抗战前期，宋美龄正是穿着这样的旗袍，征服了太平洋西岸的美国人。中国元首夫人首次如此高调地公开面对全世界。



她身着深绿色中式旗袍，披着亮色披肩，一头柔和的秀发优雅地盘在脑后，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引领下走上美国国会的讲坛——这是西方人眼中中国女性的一幅全新画面。

宋美龄请求国际社会给予中国抗战同情和支持的演讲，经由电台转播，轰动整个美国。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以一睹其风采为荣。

几个月前，宋美龄陪同蒋介石访问印度，那是她第一次以“第一夫人”身份出国，也是她在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彩排。后来，《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劝蒋介石让宋美龄去美国演说，“你让她去一次，比 30 个师都有用。”

从重庆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宋美龄的专机一共飞了 8 天——为躲避日本人，飞机在没有夜航设备的情况下在夜里穿越“驼峰”。

抵达美国的前 70 天，宋美龄住进医院，外交之外，治病是她此行的另一目的。罗斯福夫人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她们相见的情形：“蒋夫人似乎很紧张、很痛苦的样子，她不能忍受任何东西碰到她的身体。有很长一段时间，医生无法缓解她的痛苦，我认为这是长期紧张、焦虑和中国气候所造成的后果。蒋夫人颇为娇小和纤弱，看到她躺在床上，我心里想，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帮助她、照顾她。”

宋美龄于 11 月 28 日致电蒋介石告知与罗斯福夫人见面经过：今晨罗夫人准时到院，妹表示此次来美尽以私人看病，对美国政府并无任何要求。彼即谓美国朝野人民异口同声对妹极为仰慕，均认妹为全世界女界中第一人物，即彼与罗总统亦素钦慕，此次能有机会相晤，窃心庆幸……罗夫人遂谓应如何改变美人态度，而使美人感激我抗战对美之贡献。妹即谓中国之抗战，乃为全人类而牺牲，今罗夫人即与余不谋而合，真亦称忠。”

1943 年 2 月 17 日，宋美龄抵达华盛顿，并在罗斯福的安排下住进白宫。第二天，宋美龄受美国国会邀请，分别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说。

她因此成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第一个中国人。从那天至 4 月 4 日的近两个月里，宋美龄的足迹遍及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加拿大的渥太华……先后 7 次发表正式演讲。

在这个曾经生活过 10 年的国度里，这位中国第一夫人如鱼得水。纽约市长授予宋美龄“纽约市荣誉市民”称号；芝加哥市长送给她一个巨大的金钥匙；洛杉矶市长则宣布 3 月 31 日为“蒋夫人日”——她途经洛杉矶市最热闹的百老汇路时，受到近五十万人的夹道欢迎。这次出访开启了一个“夫人外交”的时代。几年后，阿根廷的贝隆夫人神采飞扬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欧洲之行。欧洲媒体将那次出访称为“彩虹之旅”，为阿根廷的外交新气象。



二战后期，宋美龄又陪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领袖讨论日本战后处理问题，并达成协议，战后日本需归还台、澎、金、马等地。

1948 年 11 月 28 日，宋美龄由上海乘机再次赴美，为正在国共内战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争取美援。与 6 年前风靡全美的访问不同，这一次她遇到的是对她极其冷淡的杜鲁门。

直到 1950 年，宋美龄才离开美国。返回时，她发表演说："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的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

途经檀香山的那天，她又对媒体说，她已经做好"准备付出任何代价"，"你们也需要用红墨水标志中国部分，但我们必定要把这些颜色，滴滴点点，一步一步抹去的。"

历史的颜色并未如宋美龄所愿被抹去——一个红色的中国诞生了。

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要对等

红色中国的第 14 年，迎来了它第一个走出国门的"第一夫人"——她的故事同样与旗袍有关。

1963 年，作为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她是刘少奇的第五任妻子，结婚之前，这位辅仁大学物理系硕士曾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译，并赴延安负责外事翻译和土改工作。

出访那一年，一袭白色旗袍的王光美以端庄华贵的气质，轰动了海内外。宋美龄访美后 20 年，人们看到又一位"中国第一夫人"身着旗袍的风采。一时间电视、报纸、电台竞相报道，印尼街头甚至打出了王光美的巨幅画像……

这次是刘少奇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出访；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非社会主义国家（1957 年毛泽东访问苏联、1960 年刘少奇访问苏联，都不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据王光美回忆，建国后，中国在外交方面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出访社会主义国家不带夫人，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则要对等。

王光美曾在《王光美访谈录》中提及："当时外事部门对这次出访非常重视，提了很多要求，要我们认真准备。"外交部礼宾司要求刘少奇夫妇订做出国服装。刘少奇觉得，"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礼宾司的人看了刘少奇家的衣服，不放心："现有的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那些丝绒旗袍根本不能穿。而且这些衣服都已穿过多年，太旧，要重新做。"



那时王光美还不知道，她的命运将被另一位“第一夫人”改变。出国前，她被安排到上海订制新衣服。江青在上海休养。期间，两人谈过三次话，每次几小时。此前，江青在 1962 年就曾被王光美抢去“风头”。那年 9 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踏上北京机场，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

《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这让江青很不高兴——她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面。于是那次，江青得到毛泽东的允许，与毛和王光美一起会见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是江青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会见外宾，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江青的照片。

王光美出访前的那一次谈话中，从未以正式身份出国的江青，特意讲到了穿戴：“你在国外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

江青不让王光美戴别针。然而后来，访问缅甸期间的晚宴上，王光美出于礼貌戴上了当时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赠送的金项链——这在“文革”中成了她的罪状。

1966 年再次出访缅甸一年后，王光美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主楼的一间屋子里。满屋子的造反派要她穿上出访印尼时的那件白色旗袍、一双高跟鞋、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

那时王光美已经发胖，旗袍太瘦，红卫兵就把两边撕开，让她穿进去。他们还拿乒乓球串成“项链”，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每个球上面都打了叉。

“第一夫人”愤怒地抗议，但没人理睬。

在最终的“审判”中，江青指使康生根据假材料给毛泽东写报告，说王光美“是一个混入我党的美帝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分子”。毛泽东批了“刀下留人”，王光美才算保住性命。

这位共和国首位出访的“第一夫人”，开始了秦城监狱里的 12 年。

话题不再神秘

当经历浩劫的中国重新走入正轨，最高领导人夫人出访也随之恢复。

1994 年 9 月 2 日，江泽民携夫人王冶坪飞赴欧洲三国。中国观众从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了这位第一夫人。



《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评价：江泽民此次出访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他夫人王冶坪的随行——这是她第一次陪同江参加高规格的出访活动；在中共历史上，这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带夫人出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这一说法并不准确。1983 年，“文革”后的中国恢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由李先念出任。李在位期间曾出访二十多国，夫人林佳楣多次陪同，只是当时的媒体很少提及。当王冶坪公开出现在媒体上时，距离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最后一次公开出访，已经 28 年。

那时，香港的一份刊物描述王冶坪“内向、仁慈、善良、热情”，“天性好静、不好声张、衣着朴素，不用化妆品”。这些都被库恩写入江泽民的传记：王冶坪的座右铭是“老有所为”，尽管颈椎病给她带来痛苦，并妨碍了她的日常活动。她认为陪同丈夫是一种“负担”，因为她说她有点“力不从心”，而且她从来不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时，国家领导夫人陪同出访开始成为常态。王冶坪陪同江泽民访问了俄罗斯、日本、法国、越南、美国……最受瞩目的两次是，王冶坪在布什家的农场里与小布什夫人劳拉一同品茶；在日本与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夫人一同观看和服表演。

与宋美龄的年代不同，中国已进入一个没有“政治强人”与“政治女强人”的时代，而当年的“夫人外交”也随之淡化。“夫人随访”成为外交中的常规性礼节，“第一夫人”的话题也不再神秘新鲜。

胡锦涛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 10 年间，中国领导人对外访问变得越来越频繁。2003 年 5 月 26 日，胡锦涛乘坐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时值俄罗斯举办上合峰会，参会的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正式外访。那一次，他的妻子刘永清也陪同出访。西方媒体极为简单地描述了中国新任第一夫人的亮相：“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清面带微笑走出飞机舱门。”

胡锦涛任国家主席 10 年的屡次出访中，刘永清常伴其左右。这位第一夫人穿着打扮得体，胡锦涛访问法国时，着深色西装，淡灰色、海蓝底领带，刘永清则搭配法国蓝套装、银色胸针和项链、奶白色高跟鞋。

媒体眼中的刘永清，性格文静，而这与她的教育背景不无关系——1959 年她从重庆巴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是胡锦涛在水利系的同班同学。2010 年 11 月，胡锦涛访问葡萄牙时，刘永清参观了首都里斯本的圣乔治古堡，在古堡对面街区与当地市民交谈。她说，葡萄牙具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并希望中葡两国人民发扬传统友谊，加强交流和了解。



又一个 10 年，共和国迎来了第五位公开出访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是，这一次，这位引起国人瞩目的“第一夫人”，给人们带来了又一幅全新画面——在成为国家主席夫人以前，她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和称职的军人。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析】

8-4 杨雨青：蒋宋联姻：政治婚姻，还是恩爱夫妻？

杨雨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副教授

> **蒋介石恼怒不已，在日记中批评造谣者“挑拨我夫妻感情，使之家庭不和，然后再毁灭我之人格”，“以达其政治叛国之阴谋，而其惟一毒辣之手段与造谣之伎俩，总以男女恋爱为其骇人听闻之因由”。**

长期为我们丑化的蒋宋联姻究竟是一桩怎样的婚姻？《世纪》杂志 2013 年第 3 期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雨青的文章《是政治婚姻？还是恩爱夫妻？——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作者根据蒋介石日记和档案，对蒋宋婚姻的情形作分析描述。

蒋宋结缘

1927 年 12 月 1 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许多报纸都追踪报道了两人联姻的经过及婚礼的盛况，并且刊发了措辞锋利的言论。有报纸评论说蒋宋结合是政治婚姻，也有人一语双关地形容为“中（蒋中正）美（宋美龄）合作”，更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枪杆子和一堆钱瓶子结婚，题为“军阀和财产的结合”。

也难怪，蒋宋的身份和背景难免让人怀疑二者结婚动机。蒋介石初识宋美龄是在 1922 年，开始追求她是 1926 年。此时蒋已年届 40，家有原配毛福梅，有两子蒋经国和蒋纬国，还有两妾姚冶诚、陈洁如；而年近 30 尚未出阁的宋美龄，出身上海富商之家，美国著名女校毕业，大哥宋子文、大姐夫孔祥熙、二姐夫孙中山，家世显赫。以世人的眼光看，蒋介石之所以与一妻二妾离异而迎娶宋美龄，固然是为她的优雅风姿所倾倒，但更重要的



还是看中了宋氏家族的雄厚财力和社会关系；而宋家三小姐之所以会对一个光头中年已婚男人动了芳心，恐怕图的是蒋氏可能掌握军政大权的无量前途。

然而，这些揣测并非事实的全部，除了种种世人眼中可能的好处之外，蒋介石想娶宋美龄，的确也是因为对她情有独钟，认定她是“理想中之佳偶”；而宋美龄也曾说过，“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

在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一年多时间里，蒋的日记中常出现“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不止也”这样的字句，流露出对宋美龄的浓浓相思。蒋介石为了追到自己所爱慕的“美妹”，又是致电致函，又是寄赠相片，又是拜访看望，有时约宋美龄在乡下小馆欢聚，有时又设晚宴招待，有时乘车兜风至深夜，有时又谈心至午夜，很是热烈。

1927年8月，蒋介石辞职下野，回到老家，恰在此时，蒋介石向宋美龄发出了求婚信，表示今已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对于宋美龄的“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如果以世俗的观念，蒋介石要获得宋家认可，应该是在自己身居高位之时，怎可能在“退而为山野之人”时求婚呢？而宋美龄如果恋的是蒋的权势，又怎会愿意嫁给这个“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呢？当然，有人会说宋美龄知道蒋介石不过是暂时下野，早晚会东山再起、重掌大权。果若如此，我们也只能佩服宋美龄有政治眼光和远见卓识了。

9月，蒋介石到上海探望宋美龄，“情绪绵绵，相怜相爱”。26日，蒋宋订婚，28日，蒋介石东渡日本，面见宋母，请其允婚，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结婚感想，宣称“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婚礼当日，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感到“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幸福得不知“身置何处矣”。次日，蒋介石在家“与爱妻拥谈”，深感“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

热恋、新婚，自是浓情蜜意，但天长日久，蒋宋夫妻的感情又如何呢？

夫妻情深

世人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婚多年的夫妻，即使没有成为怨偶，往往也会感情淡漠。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却不是这样，蒋曾在日记中深有感触地总结，他们两人的感情，是越老越深厚。

新婚燕尔，蒋宋生活甜蜜和谐。宋美龄从上海到南京来，蒋介石陪妻子泡汤山温泉，谒中山陵，游莫愁湖，拜鸡鸣寺，逛夫子庙，嬉戏不止。两人婚后的关系亲密融洽，即使



偶尔有些小打小闹，也如蒋介石日记所说，是“欢争”，即吵架也是愉快的。蒋介石虽然觉得宋美龄有些“骄矜”，但对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妻子还是既爱且敬的，吵架后能主动劝慰妻子，或者去娘家探望。对于宋美龄的劝诫，蒋介石也能听得进去，“心甚自惭”。蒋介石深感“三妹爱余之切”、“待我之笃”，可谓“无微不至”，对于自己“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感到“诚愧为丈夫矣！”

蒋介石多年领兵打仗，与宋美龄时有别离，常受相思之苦。北伐时，蒋介石有一次在车上打盹，迷迷糊糊地就觉得“三妹”在身边，可见多么想念宋美龄。另一次，宋美龄到南京来看望蒋介石后回上海，都已上车，却因不忍分离，竟然下车不走，可见二人难舍难分。在前线作战，蒋得到宋的来信，会非常高兴，正所谓“家书千金”；住进某处院落，也会强烈思念妻子和家庭，恨不得夫妻相聚。

抗战时期，宋美龄远赴美国寻求外交援助，启程前，蒋介石依依不舍，“临别凄怆，儿女情长”；分别后，蒋又黯然悲戚，觉得妻子对自己的笃爱，“世无其比也”。宋美龄访问美国的七个多月间，蒋宋之间往来电报很多，除了公事，行文中也流露出彼此的恩爱。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和生日等，自然少不了祝贺电报；平时无事，也不忘问候对方身体；“死里复生 6 年纪念日”也有往来电报，大概是感念西安事变时夫妇同甘苦共患难吧。

1944 年，宋美龄要飞往巴西治病，蒋介石非常担心，“甚以此去恐不能复见为念”。宋美龄安慰蒋介石说：“君须切记，世界上有如我之爱汝时刻不忘者之一人，汝亦可以自慰矣。”又说：“君上有天父之依托，而下有汝妻之竭诚爱护，即此足可自豪也。”蒋介石听言，离情别绪，感触万千，竟不知说什么才好，惟有祈祷上帝保佑，使妻子能早日痊愈，归来团聚。夫人走后，蒋介石像丢了魂一样，茶不思饭不香，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倍感孤独惆怅。12 月 1 日，是他们结婚 17 周年纪念日，抚今追昔，蒋介石感想万千。妻子已转赴美国求医，不在身边，蒋介石不知其症状如何，也不知其何日能归，只有在日记中伤感道：“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为叹！”

“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蒋宋这对老夫老妻之间的深情，由此可见一斑。

绯闻缠身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夫妻生活，基本上是琴瑟和谐的，但是，有时也会出现不和谐音，给他们带来些麻烦。对夫妻关系冲击最大的，莫过于疑似出轨的绯闻。抗战时期，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因绯闻而头痛过。

第一则绯闻，是关于宋美龄的，传说 1942 年 10 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重庆时，宋美龄和他偷情，蒋介石曾带兵捉奸云云。不过，这起所谓的“风流韵事”，纯属后人杜撰，在当时并未掀起波澜，蒋介石日记中也看不到痕迹，虽然后来被传得沸沸扬扬，但已被学者证伪（详见杨天石先生文章《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二则绯闻，是有关蒋介石的，说是蒋介石在重庆有了“婚外情”，宋美龄一怒之下赴巴西养病去了。这回动静可是闹大了，大到蒋介石在日记中为此苦恼，大到蒋宋夫妻要举行茶会公开辟谣。

蒋介石在日记中透露有针对他的谣言，是在 1944 年 5 月 7 日，他认为是“共匪造谣中伤”，“以败德乱行之猥亵谣诼加诸吾身”。当时蒋并不很在意，“自信此种谣言一经证明其虚妄，则正增益余之品性”。

但坊间流言蜚语越来越盛，宋美龄还接到很多匿名信，不仅诽谤与诋毁蒋介石，而且涉及蒋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有些信的语句文字，似乎出自英美人士手笔。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认为“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尚有英美人士为之相助，其用心非仅欲毁灭我个人之信誉，直欲根本毁灭我全家”。宋美龄虽然对蒋介石笃信不疑，但非常担心谣言散播，诬蔑蒋之人格，损毁蒋之道德，认为此谣不息，可使军民对蒋之信仰动摇，则国家亦不可救药矣。

无奈之下，蒋介石于 7 月 5 日举行茶会，约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共 60 人，一来为夫人饯行，二来为自己辟谣。蒋介石坚决否认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绝对服从它的戒律，他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他们的关系没有任何污点。宋美龄紧接着表态，她义正辞严地表示，信任蒋介石的人格。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长也先后发言，都称赞蒋介石为人“厚重谨严，久为众所敬服也”。

名人闹出些绯闻，媒体、舆论热衷于炒作，这些都不稀罕，但领袖人物为辟谣而专门“约集高级文武主管”开会，这恐怕是历史少见，难怪蒋介石都把这当成自己“革命过程中之一重要史迹也”。

9 日，蒋介石送夫人至机场，飞往巴西养病，但谣言并未止息，8 月 19 日，蒋介石批阅情报，得知“美国朝野对我个人生活谣诼之猜测，迄犹未已，而尤以我夫妇家庭间之事为尤甚”。1945 年 1 月，对宋美龄的谣言又起。蒋介石恼怒不已，在日记中批评造谣者



“挑拨我夫妻感情，使之家庭不和，然后再毁灭我之人格”，“以达其政治叛国之阴谋，而其惟一毒辣之手段与造谣之伎俩，总以男女恋爱为其骇人听闻之因由”。的确，公众人物的私生活最为人所津津乐道，也最易成为被人攻击的把柄，身为名人，免不了有绯闻传出，而作为政治人物，私生活的绯闻则往往被放大。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有关蒋宋两人出轨、捉奸的绯闻，始终在流传。

相濡以沫

好在传闻归传闻，蒋宋两人还是能够互相信任、彼此不疑的，绯闻插曲过去后，蒋宋夫妻的婚姻依然稳若磐石。无论发生什么国内外大事，无论蒋介石的境遇如何糟糕，宋美龄都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给他以信任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军事上却连吃败仗；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一人独裁，遭到全国各界反对；经济领域滥发纸币，垄断暴利，投机盛行，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生凋敝，民众怨声载道。

危机之下，各方矛头均指向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记中形容他当时的处境：“中外对我之侮辱，投机分子、反动军阀对我之挟制，各界各阶层对我之讥刺毁谤，所部将领如刘树勋，无耻无识，卷款潜逃，无志无勇之亲信，被俘缴械。今日环境之恶劣，可谓从来所未有，其动摇险状，似有随时灭亡之可能。”蒋介石深感“困苦忧患”，惟一能让他感到一点安慰的，“即为余妻对余之信仰与笃爱”。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蒋介石众叛亲离，曾经追随蒋的亲信接二连三地辞职不干、弃他而去，就连大姐夫孔祥熙和大舅哥宋子文也远走美国定居，只有宋美龄对蒋介石不离不弃，明知美国都想抛弃蒋介石不管了，仍“坚欲飞美一行，与马歇尔国务卿作最后之交涉”。

蒋介石深知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认为宋美龄去美国求告“决无希望”，极力劝阻夫人不必前去“自取侮辱”。但宋美龄毅然表示：“个人荣辱之事小，国家存亡之事大。无论成败如何，不能不尽我人事也。”

然而这一次，宋美龄没能像 1942 年那次访美一样，在外交上发挥第一夫人对丈夫的内助之功，获得美国的同情和援助。国民党政权终于分崩离析，蒋介石被迫于 1949 年 12 月撤离大陆，黯然飞往台湾。



到台湾后，蒋宋夫妇曾短暂借住于台北阳明山上的草山行馆，后来在山下兴建了士林官邸，在山上修建了阳明书屋，这三处居所，便成为蒋宋两人晚年在台北的主要生活场所。

如今游客到台北游览，这三处曾作过总统官邸的地方，都是可以参观的。

草山行馆内有以宋美龄和蒋介石名字命名的“美庐”和“介寿堂”，曾招待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及麦克阿瑟将军等，现辟为展示间，用来展览历史文物。馆内还设有小咖啡馆一间，据说按照当年宋美龄的喜好提供茶点餐饮，游客可体验一下当年宋美龄的生活，静静地坐下来，轻轻地捧一杯咖啡，遥想过去的情景。

在士林官邸中，可寻觅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居住的痕迹。玫瑰花园，是宋美龄的最爱，每年 3-5 月，仍然会花团锦簇；庄严肃穆的凯歌堂，是蒋氏夫妇作礼拜的地方，蒋家后代均在此完成婚礼及受洗：新兰亭，是每年为蒋介石作寿的地点，故又名“寿亭”。

阳明书屋也已成为纪念馆，有志工讲解并导览，游人可行走其间，参观蒋氏夫妇的书房、客厅、餐厅和卧室等当年生活的场所。蒋宋两人因为作息习惯不同，常年分房而睡，但寝室相连。导游说，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常年早睡早起；而宋美龄生活西化，习惯晚睡晚起。两人为了不互相影响，于是就形成各自的生活模式。宋美龄喜欢看电影，晚间常在客厅放映电影，蒋介石有时也陪宋美龄一起观看，但到晚上 9 点，即使电影没有结束，也会离席就寝。阳明书屋内有一梅园，园内奇松异草，庭池幽雅，池畔有两小圆石椅，解说员说，蒋与夫人常在园内散步，就坐在这小圆石椅上，看池里鲤鱼悠游。

这三处纪念馆内，都有大量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合影。这些照片都生动地展现了蒋宋晚年和谐相依的生活。

很难想象，如果两人只是政治婚姻，没有多少感情，如何能有这般甜蜜热烈的恋爱经过、浓情蜜意的新婚生活，相互扶持的夫妻共命运，以及相濡以沫的晚年幸福呢？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 年 5 月 31 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5 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



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



1931 年，江青（前左）在青岛时与友人合影



江青在上海时的漫画像及其签名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



“文革”的第一个打倒目标是刘少奇，但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见到刘少奇仍满脸堆笑握手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

1951 年中到 1953 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



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 1942 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 1951 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这样的部长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 1951 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 1951 年 11 月 16 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棐，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种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

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很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 1961 年 5 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最近我看了 2005 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 74 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 94 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 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 1930 年 4 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 1951 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 1961 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在与俞启威一起生活后，又与唐纳结婚

对江青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写到从"李进孩"改名为李云鹤。讲到这里江青的故事才还刚刚开始呢。

徐明清继续口述：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云鹤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文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云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 年 1 月 28 日，'晨更工学团'参与了上海各界共同举行的纪念'一·二八'两周年示威游行。俞启威和李云鹤相继暴露被盯梢，两人意识到处境危险便决定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联络被中断，李云鹤和徐明清失去联系后音信皆无，徐明清担心了很久。

"李云鹤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学团'寻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样因为避难离开了那里。1934 年 10 月 26 日李云鹤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



“据说李云鹤被抓进看守所后，叛徒并没有指证她。因为她说自己是教员，便由特务押着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遇到该部干事钟绍琴，由其证明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小俞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了很大刺激。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云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云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家乡来结婚，又给李云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哝哝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年。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

李云鹤当时哭着离开了徐明清和对她悉心关照的徐家。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段俞启威，他后来改名黄敬。我和黄敬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对他的事情知道的不少。知道他在 1935 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担任这一运动党的领导工作。1936 年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黄敬是北平市委书记。1937 年 3 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知道黄敬是以彭真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去延安参加 1937 年 5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建国后我仍旧没有同黄敬见过面。但是我现在正住着的寓所，恰好是黄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国社的姐姐住过的地方。后来黄敬做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在聂荣臻领导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不过这时候黄敬因病不能工作，我与他始终无缘见面。

江青在到延安之前，是上海滩上的二流电影演员

1936 年 8 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鹤已经改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明星，并和俞启威分手与电影圈的唐纳结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风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2 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蓝苹与江青》。在这篇文章中郁风说，从 1935 年到 1937 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党的外围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很快会员多至数百人，分组活动。有大中学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蓝苹是从 1935 年秋较早参加的，而且很积极，每周都来一两次帮忙工作。来时梳着两条小短辫，蓝布旗袍，不搽口红。她那时刚到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是陈波儿介绍来的，很快把我们当作好友，表现热情。那时陈波儿已是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蓝苹名气大得多。那时电通正在拍《自由神》，王莹主演，蓝苹在剧中只演一个不重要的配角女兵。郁风年龄最小，只有 19 岁，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个。蓝苹只比郁风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郁风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郁风同路走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蓝苹把郁风当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诉郁风如何对付特务跟踪之类。后来到快离开上海以前，郁风才从领导她的人那里知道：蓝苹不过和她一样在一所以女青年会名义办的女工夜校教课。

1936 年初，业余剧人协会要排宋之的写的新剧本《武则天》，导演等选中郁风饰演武则天 B 角。郁风谢绝不干。但是导演等不放弃，一再说服动员。蓝苹也极力劝郁风答应，蓝苹早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她对这出戏就很有兴趣，是她帮助郁风背台词，两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70 年代的江青曾对访问她的维克多说：“我 21 岁就一举成名。”指的是 1935 年她 21 岁时参加业余剧人协会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郁风写道，其实蓝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这个角色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

郁风还讲了蓝苹一件事：1936 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团体演出只用一个演员和一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蓝苹一口答应扮演杀死自己婴儿的那个失业女工。

郁风的文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也很真实。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觉得把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得更清楚。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



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余兴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独唱，还有孙师毅为此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词中有："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不忘宣传抗日。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蓝苹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风还说，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翩翩、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 1937 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有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关于蓝苹（江青）与唐纳间的绯闻，连从来一点儿不关心这类事情的我，当年耳朵里不知道从哪里也刮进过几句。最近看到郁风所写《蓝苹与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这样的新闻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一点。



1937 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写，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的 1 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市委委员。7 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说自己在上海无事可做，又已经与唐纳分手。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 1937 年某一日，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登载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没有再改动。

徐明清明白蓝苹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蓝”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 1938 年 11 月，她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 年他还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他给我讲了关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徐明清、江青、还有王实味四个人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党小组里学习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江青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党校。这时候王实味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江青已经有“主”了。何洛问这“主”是谁？徐明清说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明清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泽东的名字说出来了。

何洛讲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前有这样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过一场俄国的活报剧，只有三个演员，一个是女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来了。剧情就那么简单。

后来，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我是 1939 年 7 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 2004 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



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 1937 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 29 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从她在党内的地位来说，她在延安时候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1940 年 1 月 21 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现在《新中华报》上，组织上就安排她做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后面。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 1941 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

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女孩子李讷，算起来应该是在延安时生的。

补讲一节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于不想被从李进孩到李云鹤，再到蓝苹，最后到江青这些名字演变插乱，本来应写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补记一节。

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很活跃，和毛泽东同志配合得很好。当时情况是：

1950 年底到 1951 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是“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 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 43 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员。1951 年 6 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



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看来后来江青到武训的家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对武训之为人早已有定评。调查云云只不过为取得更多的事实根据而已。

前面讲过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正处长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去山东武训家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现在是地级市聊城下的一个县级市）、馆陶（现在属于河北省的邯郸市）做调查这件事，毛泽东重视程度可以说异乎寻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袁水拍把这照片挂在家里墙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袁水拍的许多东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来归还抄走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都还了，唯独照片没有退还。

袁水拍后来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宣部，文革时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的同一座楼的牛棚里头（而且是同一个房间）。这个情况是他直接告诉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进行点名批判。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党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在5月30日中央通知陈伯达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



理组长职务。5 月 30 日中央专门发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很特别的。它可以说明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这时候的江青，不只是权大、势大，她还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的称号“旗手”。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性质还是“夺权”的阶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1966 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林彪和江青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江青要求的仪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 1924 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员。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门挨斗。两年之后的 1968 年，我被集中住进了“牛棚”。那时“牛棚”成了时尚。中宣部的“牛棚”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有许多机关都在市委党校设“牛棚”。我们中宣部占了一座楼。中宣部的黑帮占了好几间房。我、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还有一个副处长，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六个人住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牛”，不让我们睡床，躺在地板上。我们六个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边写“交代”。除非接受外调，不管有没有话可说，一定要这样趴着写“交代”。晚上被关在“牛棚”没人管，大家就胡说八道起来了。我们说的话，尤其是包之静讲他同江青过去相识时的事情也就没遮拦地讲起来了。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们就“斗争”包之静，说你是不是还妄想江青保你？幸亏她把你忘了，否则也许你就没有命了。包之静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问汪道涵，汪说他的确早就听包之静告诉过他这件事。如果那时房间里有窃听器，我们全是“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6 蒯大富，米鹤都：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



蒯大富：1967 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文革时期“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

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

”





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学生批斗王光美场面



1963 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文革前，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登在《新清华》头版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灌输这些。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大概 1966 年 6 月 3、4 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



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 月 13 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 月 16 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 6 月 19 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派？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得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 6 月 21 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激辩工作组



文革初期蒯大富在一次大会上演讲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 6 月 21 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它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 6 月 24 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 月 24 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注 1）。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如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 11 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第二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的工作作风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 800 多还是 700 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 20 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 月 25 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 6 月 28 号到 7 月 3 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揭发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 月 3 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 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开始绝食。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 4 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他们就是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 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被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

毛泽东救了我


看，刘少奇的醜恶灵魂

刘少奇是什么人？

井冈山

清华园内春来早

伟大的号召 巨大的鼓舞

文革中清华井冈山编印的《井冈山》报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 年 7 月 18 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 月 19 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 7 月 20 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 18 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

大约 21 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



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 月 29 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 7 月 28 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的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 7 月 20 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 月 27 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 8 月 3 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与周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的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



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 13 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 1944 年入党的，母亲是 1945 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所在地。

周恩来很亲切，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 6 月 1 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 20 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 20 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 7 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



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 7 点多讲到 10 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 月 5 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 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 月 4 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余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后来我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 1966 年 9 月 6 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 9 月 17 号到 20 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注 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 月 23 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 10 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 13 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注 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 月 6 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



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声名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 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吧。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骗斗王光美

1967 年 1 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地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 1 月 6 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 6 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秘书就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 月 6 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 4）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 月 26 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 1966 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 12 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 年的 9 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注 5）。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 月 18 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 1991 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注6）。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 12 月 25 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 5000 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 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 12 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 月 25 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 月 30 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内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



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1967 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1967 年 1 月份，王洪文到清华来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名气比他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 1967 年 4 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 月 3 日和 4 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 4 月 10 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闲扯的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



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注释：

注 1 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注 2 整理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 9 月 18 日起，20 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注 3 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注 4 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注 5 见前注。

注 6 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整理者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1991 年夏，我去北京蓟门桥的王力家。王力对我说：1966 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当时他夫人也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观】

8-7 周俊生：组织安排的婚姻，你要不要?


周俊生： 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

“在革命的年代里，宏大叙事笼罩了一切，个人的婚姻也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对于投身于革命的女青年来说，在这方面也就比男青年多了一个义务，将自己的身体以婚姻的名义祭给革命，以此来接受组织的考验。”

上海出版的《新民周刊》有一个叫做“不老的爱情”的栏目，每期介绍一对名人或非名人的爱情婚姻故事，读来颇有琳琅满目之感。前不久的一期介绍了几十年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邢燕子的婚姻故事，题目赫然是《组织安排给我的丈夫不错》。

邢燕子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 80 后、90 后来说，实在有点太陌生，但是她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政治版图上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早在大规模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之前，她就因放弃城市生活而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理所当然地成为后来那一场给整整一代中国人带来巨大精神创伤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一面颇有号召力的旗帜，她本人也因此而获取了巨大的政治荣誉。

如今，这段历史已经“雨打风吹去”，邢燕子也从当年风华正茂、英姿飒爽的革命女青年成为一个正颐养天年的老奶奶，当她重新回到媒体面前的时候，她的那段昔日的辉煌已经缺少合适的语境表达，因此，能够向人们讲述的便是个人的婚姻了。

这是一段怎样的婚姻呢？邢燕子说，还在她只有 18 岁的时候，领导就要求她与大她 7 岁、辈分也大她好几茬的王学芝结婚，邢燕子感到非常委屈。但是，领导自有领导的考虑，“王学芝家世代贫农，党龄长，出身好，人也实在，能干，配你邢燕子，再合适不过。”面对领导的要求，那时候开始走红的邢燕子，已经懂得了“政治上的服从高于一切”的革命道理，就这样，她在情窦未开的情况下，就走进了婚姻，尽管心里头有点失落，她也只能埋在心底，继续战天斗地。



时光匆匆过去了几十年，邢燕子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但她与王学芝的这段婚姻终于维持了下来，今天，她心满意足地与老伴相拥在一起，由衷地感叹："组织安排给我的丈夫不错。"一曲"不老的爱情"就这样通过媒体的传播得到了升华。

邢燕子既然对自己的婚姻从不满意到满意，想必她一定对当时指定她婚配的组织心存感激。但是，邢燕子显然忽略了一点，当时的组织包办她的这门婚事，不可能是为了让她在这场婚姻中得到爱情的滋养，而是为了让她树立一个完美的与农民结合的样板。在邢燕子这样一个连身体都奉献给农民的时代楷模的激励下，上山下乡成为一代青年追求的目标，颇有战争时期的有志青年走上战场那样的义无反顾，自然，女知青为了显示自己的扎根意志，接受组织的安排嫁给农民，而且是必须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也曾经蔚然成风。只是这更多的女孩子没有邢燕子的觉悟，她们与农民丈夫无法产生婚姻所必须的共鸣，从而出现了无数的悲剧。相对于今天因为当年开了一代新风而如今有资格安享晚年的邢燕子，她们能够品尝的，只有那个荒唐的年代强加给她们的苦果。

在革命的年代里，宏大叙事笼罩了一切，个人的婚姻也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对于投身于革命的女青年来说，在这方面也就比男青年多了一个义务，将自己的身体以婚姻的名义祭给革命，以此来接受组织的考验。

前不久出版的《高岗传》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记录了高岗这个曾经的革命家的几次婚姻，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投奔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个人婚姻上的手足无措。李力群，一个 17 岁时到了延安的女孩，在党校学习时被来做报告的首长高岗看上，高岗很快与自己的小脚老婆离婚，对李力群展开了进攻。革命家的恋爱攻势没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复杂的程序，李力群在党校的学习结束时，组织将她留了下来，在高岗身边工作。

有一天，毛泽东请高岗和她吃饭，毛在她面前大夸高岗，要她向高岗学习。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高岗和她吃饭，席间就宣布这一天是高岗和她结婚的日子。李力群一听这话，撒腿就跑，但王若飞找到她，跟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王若飞对她说："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就这样，李力群在和高岗在毫无感情的情况下，没有经过一天恋爱就嫁给了他。多年以后，当高岗的革命家形象消失以后，李力群对陈云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

其实，李力群大可不必如此怨天尤人。组织在安排她嫁给高岗时，已经把她纳进了组织的架构之中，在高岗身居高位之时，李力群实际上也享受到了她作为首长夫人应得的待遇，如果高岗能够一生站在革命事业的"高岗"上，那么即使他今日已经死了，他的余荫仍可照拂着李力群经常向我们回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可惜的是，高岗后来被定性为



“自绝于人民”，使这段革命婚姻暗淡了下来，也使李力群无法抵达那个本来已经触手可及的高度。

当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向女青年发出婚姻的召唤时，她们将如何应对，是她们在投入革命时未曾考虑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邢燕子、李力群响应了组织的安排，得到了或一度得到了由组织分派给她们的一切。一个可以想像的图景是，如果邢燕子当时拒绝了组织的要求，她就不可能得到今天仍然在身的荣誉，甚至连进入“不老的爱情”的资格都将不再具有。而那些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女青年，她们的革命生涯从此将充满灰暗。在这方面，虽然大量的实证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是小说家的作品却为我们提供了样本。

张弦，这位年轻时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我们留下了一批不应该遗忘的优秀作品，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被改编为电影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但张弦还有一个同样是反映婚姻问题的小说却未引起广泛注意，那就是《挣不断的红丝线》。小说讲的是一个叫傅玉洁的女孩，战争年代参加了部队文工团，被一位首长看上，但她因为忠于自己的爱情而拒绝了首长，她嫁给了文工团里的一位青年才俊，陪伴着他走完了战战兢兢的一生，受尽了苦难。

与此对照，文工团另外一位女孩则因接受了另一位首长的求爱而从此飞黄腾达。岁月倥偬，当傅玉洁步入晚境的时候，她那个早已在政治高压和柴米算计中将才气消耗殆尽的丈夫已经告别人世，而当年曾经追求她的首长此时也正好因丧偶而孤身一人，傅玉洁那位当年在文工团的团友，现在的马列主义阔太太为他俩串起了红线。当傅玉洁应邀来到首长的家里时，她因为烟熏火燎而不再滋润的脸庞似乎舒展开来了，她从内心深处发出疑问，当年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张弦虽然早已因为贫病而离开人世，但他通过这个作品把一个问题留给了活着的我们：组织安排的婚姻，你要不要？

随着革命话语的逝去，今天的组织，已经不再动用革命的名义来安排女孩子们的婚姻了，但权力仍然可以随时以各种名义介入人们的私生活，这也使女孩子们面对着上一代人所没有经历的诱惑。现在，网上时常出现某一女子曝光某一高官与自己的错爱之情，还有手机短信或者 Q Q 聊天记录为证呢。当年的高岗为了追求一个年轻女子，还不得不先行抛弃糟糠之妻，今天的手握权柄之人，已经省去了这一道婚姻的外壳，轻松地直达床笫。

写到这里，我想本文的标题也许应该改一下：权力安排你当二奶，你上不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8 王丽英：遇罗锦离婚：一个女人与一个时代

> **“判决书说：“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因此，判决两人离婚。”**

1980 年《婚姻法》颁布前后，社会出现了一轮离婚潮，其主体主要是“上山下乡”后返城工作的知识青年，其中的“遇罗锦离婚案”更是引人注目。

是单纯追求爱情，还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一件小小的离婚案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只因为那个时代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与现在不同。

遇罗锦，是因一篇《出身论》而受极刑的烈士遇罗克的妹妹。“文革”结束后不久，遇罗锦发表了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详实记录了她的家庭、经历和婚恋，甚至大胆地写出自己的婚外情，这在当时堪称文坛的一颗炸弹。几年以后，在人们谈离婚色变的年代，她又因第二次婚姻破裂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结婚：“为了生存的选择”

遇罗锦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是出色的土木工程师。母亲王秋林曾两度留学日本，是成功的实业家，并当选过市人大代表。1957 年，遇崇基和王秋林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遇家开始遭遇劫难。

“文革”初期，遇罗锦的哥哥遇罗克因发表《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而遭逮捕，并于 1970 年 3 月被处死刑。遇罗克被捕前，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于是，遇罗锦被定为“思想反动分子”，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 3 年。



1970 年 3 月，劳改农场解散，遇罗锦又被转到河北临西县插队落户。那里的工分值多年没有超过一毛钱。迫于生活，她到黑龙江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结了婚，户口得以从贫困地区迁到东北。他们婚后生有一子，但由于没有感情基础，4 年后离婚。没有出路的遇罗锦又回到北京谋生，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其间母亲经常发脾气，要她尽快嫁人。现实的困境和家庭的压力使她不得不考虑再找个对象。

经人介绍，1978 年 7 月，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据她事后自己的总结，他们两人各有三图："他图我：1.我永远不想生孩子。2.介绍人说我很能干，在经济上绝不会拖累他，他很相信并也看出我不是懒虫。3.他认为我的外表和他原来的爱人不同，他喜欢学生样的人，尽管他出身城市贫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却希望女方是知识分子。我图他：1.他有个孩子，而且从小就和她奶奶单过，我很满意。2.他有间房，我可以有落脚之处。3.他给我的印象还算老实、忠厚、正派。"

离婚：追求幸福还是忘恩负义

但是，两人一起生活才两年，婚姻就触礁了。1980 年 5 月 16 日，时年 34 岁的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提出离婚。

这个离婚的背景是，就在一年前，也就是 1979 年 5 月，遇罗锦的日记问题得到了平反。两个月后，她回到原先工作的玩具六厂上班。4 个月后，遇罗克的问题也得到平反，遇家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遇罗锦的户口也已在婚后不久就从东北调回了北京。

生活境遇发生了重要变化，她的婚姻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1980 年 4 月，也就是提出离婚一个月前，她突然在外面找了一间农民房，开始与蔡钟培分居。

对于离婚理由，遇罗锦在诉状中说："我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别的语言。玩不到一块，想不到一块，说不到一块。"在向法院呈交的材料中以及其他场合，她不止一次举过这样的例子：

我爱看的电影，他不爱看。我们一起去看《瞧这一家子》，走出电影院，我说："张岚演得真逗。""张岚？张岚是不是演胡主任的那个？"

去香山游玩，我心里想的是这片景色多美多静，他却忽然说："昨天我路过菜市场，那儿正卖处理黄花鱼，两毛五一斤，我真想去排队。"

看画展，人们都在静静地看，唯有他的声音响彻室内，大言不惭地给孩子讲绘画"原理"。



“钟培是好人。”遇罗锦在写给单位的材料里写道，“但绝不是我心目中的爱人。他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希望我能从爱人身上学点什么，能对我的精神有所启发……我对他没有爱人的感情。我应当结束这种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

突然的离婚请求给了过惯普通生活的蔡钟培非常大的打击。他在答辩中写道：“我们经人介绍自由恋爱，结婚以来两人根本没发生过什么大的口角……生活一直很美满，经常一起去看电影。5 月 2 日，她还买了两张《蝴蝶梦》的票，看完后回家吃的中午饭，怎么能说玩不到一起呢？”

他还强调：“我们在婚后两年多，齐心协力办了 3 件大事：第一件，把遇罗锦的户口调到北京。第二件，帮遇罗锦找工作。第三件，为遇罗克平反。这证明我们婚后并不是如遇罗锦说的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而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

“遇罗锦提出要结束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而实际呢？她是在自己的环境、地位、条件发生变化后，变了心。我觉得，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考察她的几次婚姻状况，她实际上是想把婚姻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一个个跳板。”

面对道德谴责，遇罗锦坦然答道：“我并不是不懂道德，而是有罪：自欺罪、欺骗罪。我没有爱过谁，却要和谁去结婚。”她大声疾呼：“我是否应当因为我自欺过，而把继续和蔡钟培凑合过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永远自欺地过下去？”

审判：一波三折终解脱

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蔡钟培起初坚持不离婚，后来态度发生转变，但他强调，婚前遇罗锦说没结过婚，也没说劳动教养 3 年的事，是欺骗了他，必须把问题的性质说清楚才同意离婚，并且要遇罗锦赔偿他的饭钱以及买自行车等方面的经济损失。其后，他又向法院反映遇罗锦与别人有不正当关系。

遇罗锦也开始反击，证明婚后自己在经济上为全家做出的贡献更大，并且要分一半家产。显然，双方定然不会在一起生活了，但一个想要结果，另一个想要说法。

审理期间，想要说法的蔡钟培主动给报社写信，要求组织群众就自己的离婚诉讼开展讨论。其后，两家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杂志公开组织了大讨论：婚姻是以政治、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报社、给法院，也有要求法院转给遇罗锦本人的。



尽管有部分人倾向于支持遇罗锦，但是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一边倒地谴责遇罗锦，指责她利用婚姻做跳板，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人民日报》甚至刊登消息称遇罗锦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新华社更是刊发了题为《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内参。一件小小的离婚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80 年 9 月 25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党春源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书说："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因此，判决两人离婚。判决宣告后，蔡钟培不服，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1981 年 1 月 19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判对"草率结婚"和"婚后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决定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1981 年 1 月 28 日，朝阳区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于是，遇罗锦与蔡钟培又开始了新的拉锯战。

1981 年 2 月，在案件重新审理过程中，遇罗锦又写出《春天的童话》，想用文字来回答舆论的谴责。她还认为新华社内参中很多是"无中生有"、"任意夸大"，尤其是"她对一个老干部的追求"。

根据遇罗锦自己的表述：1979 年 4 月，自己与某报社马姓老干部认识后，马向自己暗示没有爱人，并且主动写信、赠送照片和纪念品追求她。由于他曾表示出支持哥哥遇罗克的倾向，并且有着自己向往的"精神交流"，所以自己也并非没有表示过好感，但没有不正当关系。遇罗锦提出离婚后，马向法院以及媒体说是遇罗锦主动追求他，但一直遭到他的严厉批评。

在进一步查清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法院对遇罗锦和蔡钟培做了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双方最终同意调解离婚。

28 年过去了，这桩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离婚案早已退出人们的视野，在那个极左思潮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里真实地表达自己、勇敢地解放自己的遇罗锦也逐渐被人们淡忘。

据说，与蔡钟培离婚后不久，遇罗锦与北京钢铁学院的教师吴范军相识并结婚。1983 年，曾经翻译《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一名德籍华人出版商邀请遇罗锦到德国短期访问。其后遇罗锦辗转定居在德国，一直没有回来过。其间她多次想接丈夫赴德，但吴范军坚决不去。1992 年，在僵持的情况下，吴范军主动提出离婚。1993 年，遇罗锦和德国人海曼结了婚，她说自己过得相当安宁愉快。



（本文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 2009 年 5 月上半月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童亚琦

设计：潘雯怡，

校订：施鈺涵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